

张艺曦著《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

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委员会，2006

何淑宜

（台湾师范大学 历史研究所，台湾 台北）

思想家的学术理念如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关连？近代基督教史家特尔慈（Ernst Troeltsch）认为，所有的宗教教义或神学思想都反映了孕育该思想的社会环境的作用。¹其实学者的思想亦然。许多思想、学术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只要我们转换观察的视角，或许就能看到另一幅与先前不同、思想与社会交错接榫的历史图像。²张艺曦新近出版关于明代中晚期江右王学的研究，即是以社会史的取径切入讨论阳明心学发展的尝试。

张艺曦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事王泛森教授，受到严谨的思想史研究训练，主要的研究关怀是明代理学的发展，尤其是阳明心学与明代中后期政治、社会的关系。本书由他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列入台大文史丛刊出版。书中内容虽说聚焦在一群心学家身上，不过有别于历来的思想史研究，他并未再将重点放在个别学者的思想创发，或是只谈学派的思想观念，而是企图在现有关于王学研究的丰富成果之上，将江右王学的发展放在明代中后期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脉络下考察，着重探讨江右王学如何在地方上传播、草根化，王学学者从事的社会事业与思想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地方社会扮演的角色等等课题。

本书除导论、结论之外，共分六章，书末并附录两篇关于安福一地联宗合族，及探讨吉安府价值观转变的相关文章。正文部分，作者以江右王学的两处重镇——江西吉安府的吉水和安福两县为考察重点，全书环绕着两个主轴进行，一是在这两个地方王学透过什么样的管道传播，另一个主轴则是王学学者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基本上第三、四章处理的是第一个问题，而五、六章则讨论后一个课题。

在本书的导言中，作者首先详尽说明书中采用的资料、研究方法与研究脉络。进入第一章后，则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江西浙江两地地方志（尤其是府志）的人物传重构这些地区宋元以来理学发展的图景。透过比较浙江、江西两地自宋代到明代中期以前的学术发展，他指出相较于宋元，明代中期以前两地的思想界在理学传承上其实出现了一个真空层，因而引起各方学术的竞逐。在这个时期，地方上出现的一些小读书人虽然无力担负起传承理学的重任，但却展现出对理学追求的热诚，王守仁提出的新说在很大程度上颇能吸引这批地方上的读书人。此外，作者也提到《传习录》这本小册子在传播王学思想上的重要性，它卷帙不多，很方便自修研读，加上内容以问答、书信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即解答了心中疑惑，因此许多人接触王学几乎都是由研读该书入手。

第二章作者转入讨论吉安府王学的特色。在王学的大框架下，他认为更应该注意学术的地域性，从吉安学者对圣人的观点与万物一体之说的看法，更可见他们与其它王学流派的差异。吉安王学学者较重视过程与功夫，不轻易尊人为圣，他们理解的圣人不只是在本体上致良知，更需要在言行事为，尤其是人伦日用上落实其作为，而这样的圣人观与他们对「万物

¹ 特尔慈（Ernst Troeltsch），《基督教社会思想史》（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0），页 1-14。

² 九 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强调应该重视思想观念与政治、社会脉络的互动，如 Elman 关于清代常州学派研究，余英时对朱熹的重新讨论等。参见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出版社，2003。

一体之仁」内涵的理解密切相关。吉安学者将王守仁由宋儒的概念中承继而来的一体说，更具体地与他们身处的家族、乡里环境结合，乡里经世成为他们可以作为与必须作为的动能，也是成圣过程的步骤之一。透过前两章的描述，作者全景式地勾勒浙江、江西理学的概况、吉安一府在江西的特殊性，以及该地学术发展与其它地区的差异。但是作者必须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孕育吉安王学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为了解决上述的问题，作者在三、四章中以吉水、安福两县为例，探讨两种不同的学术传播途径。首先是吉水同水乡。同水乡为罗洪先家族的聚居地，作者利用族谱、地方志，尤其是文集的相关资料，详尽地串连出该乡以罗洪先家族为中心，透过姻亲、联宗合族、地缘上的群聚等关系，顺利地将王学经由家族的人际网络传播于当地不同家族成员之中，而学术传递所涵盖的范围不只是少数拥有高功名的家族菁英，更吸引了许多低功名或没有功名的族人，成功地达到作者所谓“学术草根化”的效果。同样属于吉水，作者另外以在县城发展的邹元标为例，说明家族的网络对学术是否能深植于一地的影响。邹元标主要的活动场所是书院，虽然部份书院的建构有赖于当地家族的支持，但是书院讲学往往与家族、地方的互动较少，不似依靠家族成员一代带着一代学习，因此不易深耕地方，加上邹氏主讲的书院又接受官方的资助，使得学术发展更容易受到政治力的干扰。

与吉水相对照，安福则是另一种传学的模式。安福四乡分别有金滩王氏、三舍刘氏、濂源邹氏、南溪刘氏等家族，由于这些家族的居住地较分散，因此他们主要依赖水路交通如泸水、修水沟通往来。这些家族在学术领袖如邹守益、刘元卿、刘孔当的领导下，不仅定期举行家会、乡会等乡里讲会，各乡的学者也会共同聚讲于县城的复古书院。家族的支持加上固定而建制化的讲学空间，是安福在传学方式上与吉水同水乡最大的差异所在。

本书作者对吉水、安福两地王学传播途径的探讨，为我们在众所熟知的阳明讲会之外，勾勒出另一种与学者身处的乡里社会、生活形态密切结合的传学方式。描述不同的模式时，作者的分析也非常细致。不过，有些细部的问题或许可以再做厘清。作者提到吉水同水乡主要靠家族网络传播王学，但是文中并未清楚描述这些受王学吸引的家族成员所进行的学术活动是什么？是不定期的讲会？或是类似安福的家会？意即来自不同家族的学者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凝聚他们对王学这门学术的共识？再者，作者提到同水乡因为绵密的家族网络使其草根化程度深，而且持续长久，那么安福地区的草根化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安福透过讲会与家族的共同作用，也影响到一些低层的士人或乡里处士，但是万历中期以后仍旧敌不过外在环境的冲击，王学在此地的发展逐渐受挫。导致两地之间有如此不同发展的因素是什么？作者或可再尝试清楚的说明。另外，则是此一部分写作上的建议，作者在这两章中，十分详尽地描述各个不同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往来，但因为是彼此的关系穿插在正文的行文中，读来难免有雾里看花，容易迷失之感，建议作者可辅以各式人物关系图或简表，帮助读者理解，并且更准确地掌握作者提供的讯息。

如前所述，本书的第二个轴心是处理王学学者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作者在五、六两章中即以安福、吉水两地学者从事的地方工作为主展开论述。作者的基本前提是，学术若要在—地生根，除了思想内容上与时俱变，也必须在实务工作上担负一定角色，才能争取乡里的认同。（页 275）作者以此检视两地王学学者所从事的地方工作，包括联宗合族、地方建设、乡约、丈量土地、赋役改革等。其中，土地丈量与赋役改革是最特出的两个项目。这两项工作最容易碰触政治禁忌，但也最能表现两地王学学者从事地方工作的特色。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嘉靖年间邹守益在安福、罗洪先在吉水，各自带领底下一批讲学师友从事土地清丈，并且越级上书呈请改革水马夫银、清除虚丁。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倾向王学的官员的支持，也因为学术草根化后王学社群的组织性与行动力，使得王学学者在这些工作中具有极大的主导性，加上利用家族的网络，有效化解地方的反对声浪，改革因而得以成功。

作者认为嘉靖年间王学学者敢于从事清丈这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工作，他们受到“一体说”的影响，而抱持的学术使命感是不可忽视的要因。当然，相较于明代后期，嘉靖年间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也让他们得以大显身手。不过，一体之仁落实在地方工作上，显然仍有局限，嘉靖后期吉水、安福、永丰三县的王学学者因为水马夫银而产生的争议，即隐约可见他们的眼光仍以最亲近、切身的自身乡里为主。

除了地域的限制，作者继续考察万历以后两地学者的地方工作。他发现张居正当政以后政治紧缩，以及排挤王学，使得官方逐渐收回下放的权力，后继的吉安王学学者也无法像其先辈般可以毫无顾忌的施展抱负。这时期的清丈与赋役改革几乎都是由官方（知县）主其事，王学学者并没有多少主导权，加上他们在中央政治上亦无施力之处，因此在万历朝之后，吉安王学也逐渐被边缘化。经过对上述诸多课题的考察之后，作者在全书的结论中重新反思儒学作为传统中国中坚阶层（士阶层）的主要学术力量，究竟如何面对近世社会，尤其是明代中晚期之后的政治、社会变动？他认为王学是近世儒学思想响应一连串变动，企图重建合理秩序的诸多学说中，走得最远的一支。吉安王学在王学系谱中虽被视为是极为菁英的一派，但是他们其实与历来被视为较为平民化的左派王学有着一致的趋向，即是实践“觉民行道”的路径，并在乡里生活与地方工作中寻求合理秩序重建的机会。

作者对吉安王学学者从事地方工作的讨论极具有启发性，他在结论的部分也稍微比较了同时期左派王学学者的乡里工作。不过在晚明的这段期间，即使在王学大盛的时候，各地仍有许多程朱学者存在，尤其后来学术上由王反朱的声浪渐起时，许多地方上的程朱学者也领头从事各种救济乡里或教化地方的工作。因此，作者若能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比较吉安王学与其它地区程朱学者的作为，相信对于在晚明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定位吉安王学有更大的帮助。

本书与历来处理王学思想史的著作在材料运用与切入角度上有极大的不同。作者藉由细细勾勒文集、地方志、族谱中的人物资料、往来书信、谱序、寿序等，串连起地方社会复杂的家族、学术网络。尤其是在我们所熟知的王学著名学者之外，透过描述另一些人对学术、家族、地方活动的参与，让一个个原来不被研究者留意的乡里小读书人跃然纸上。这些作者称呼为“小名字”的士人，与罗洪先、邹守益等学术领袖的共同合作与活动，才更加完整呈现明代中晚期王学思想与地方社会互动最具体的图像。这种由下而上（bottom-up）观察思想与社会的视角，是传统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该如何结合的饶富意趣且深具意义的尝试，而作者最主要的关怀——学术理念、社会工作与乡里社会，也透过这样的切入途径有效地整合为一。

收稿日期：2008-1-9

作者简介：何淑宜，女，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